

現代文選及習作

第三冊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現代文選及習作教研組編

一九六一年八月



(現代文選及習作第三冊)

字 數：202,130 字

印 數：1—1005 本

定 價：*9/60* 0.58 元

西南師範學院印刷所印刷

現代文選及習作第三冊目錄

一	关于重慶談判	毛澤東	(1)
二	《魯迅祭感選集》序言(節選)	瞿秋白	(7)
三	春的歌頌	瞿同文	(17)
四	秋夜	魯迅	(21)
五	歌頌祖國		(23)
	步步向太陽	(藏族)饒斯巴桑	
	回音壁	(么老族)包玉掌	
六	馬鈴响來玉鳥叫		(27)
七	林家鋪子	茅盾	(35)
八	栽在套子里的人	契訶夫	(65)
九	鐵路工地上的深夜	杜鵬程	(77)
一〇	依依惜別的深情	魏巍	(84)
一一	英雄的列車	郭光	(89)
一二	天山景物記	碧野	(98)

閱讀課文

一	別了，司徒雷登	毛澤東	(104)
二	論趙樹理的創作	周揚	(110)
三	時雨首		
	回延安	賀敬之	(120)
	公祖一家人	張老民	(123)
四	李双双小傳	李准	(129)
五	老三姐	馬識途	(154)
六	為了忘却的紀念	魯迅	(168)
七	笑千家福永福	趙樹理	(179)
八	佛子山的曙光	冉以	(199)

關於重慶談判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談一談目前的時局問題。這是同志們所關心的問題。這一次，國共兩黨在重慶談判，談了四十三天。談判的結果，已經在報上公布了^①。現在兩黨的代表，還在繼續談判。這次談判是有收效的。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承諾了避免內戰，兩黨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這是達成了協議的。還有沒有達成協議的。解放區的問題沒有解決，軍隊的問題實際上也沒有解決。已經達成的協議，還只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

國民黨一方面同我們談判。另一方面又在積極進攻解放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不算，直接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已經有八十萬人。現在一切有解放區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準備打仗。“雙十協定”上第一條就是“和平建國”，寫在紙上的話和事實豈不矛盾？是的，是矛盾的。所以說，要把紙上的東西變成實際，還要靠我們的努力。為什麼國民黨要動員那麼多的軍隊向我們進攻呢？因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滅人民的力量，消滅我們。最好是很快消滅，縱然不能很快消滅，也要使我們的形勢更不利，它的形勢更有利一些。和平這一條寫在協定上面，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實現。現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當大，例如在山西的上黨區。太行山、太岳山、中條山的中間，有一個腳盆，就是上黨區。在那個腳盆里，有魚有肉，閻錫山派了十三個師去搶。我們的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這一關，我們“對”了，“爭”了，而且“對”得很好，“爭”得很好。就是說，把他們的十三個師全部消滅。他們進攻的軍隊共計三萬八千人，我們出動三萬一千人。他們的三萬八千被消滅了三萬五千，逃掉兩千，散掉一千^②。這樣的仗，還要打下去。我們解放區的地方，他們要拼命來

爭。這個問題好象不可解釋。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地爭呢？在我們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嗎？這是我們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們也是這樣，那就統一了，都是“同志”了。可是，他們不會這樣想，他們要堅決反對我們。不反對我們，他們想不開。他們來進攻，是很自然的。我們解放區的地方讓他們搶了去，我們也想不開。我們反擊，也是很自然的。兩個想不開，合在一塊，就要打仗。既然是兩個想不開，為什麼又談判，又成立“雙十協定”呢？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一方面看。在重慶，有些人認為，蔣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騙人的，要同他談判出什麼結果是不可說的。我遇到許多人都給我這樣說過，其中也有國民黨員。我向他們說，你們說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據的。我十八年之經驗，深知是這麼一回事。國共兩黨一定談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事情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還有許多因素，使得蔣介石還不能不有很多顧忌。這里主要有三個因素：解放區的強大，大後方人民的反對內戰和國際勢形。我們解放區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軍隊、兩百万民兵，這個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視。我們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中所處的地位，已經不是一九二七年時候的情況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時候的情況了。國民黨從來不肯承認共產黨的平等地位，現在也只好承認了。我們解放區的工作，已經影響到全中國、全世界了。大後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我這次在重慶，就深深地感到廣大的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們不滿意國民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們方面。我又看到許多外國人，其中也有美國人，對我們很同情。廣大的外國人民不滿意中國的反動勢力，同情中國人民的力量。他們也不贊成蔣介石的政策。我們在全國、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反對中國內戰，主張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們解放區的人民，還有大後方的廣大的人民和全世界的廣大的人民。蔣介石的主觀願望是要堅持獨裁和消滅共產黨，但是要实现他的願望，客觀上有很多困難。這樣，使他不能不講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我們也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來邀請，我們講現實主義去談判。我們八月二十八日到達重慶，二十九日晚上，我就向國民黨的代表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就產生了和平團結的需要。我們要求了，但是沒有實現。到西安事變以後，

“七七”抗戰以前，才實現了。抗戰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內戰是沒有斷的，不斷的大大小小的磨擦。要說沒有內戰，是欺騙，是不符合實際的。八年中，我們一再表示願意談判。我們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上也這樣聲明：只要國民黨當局“一旦願意放棄其錯誤的現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們是願意和他們恢復談判的”。④。在談判中間，我們提出，第一條中國要和平，第二條中國要民主，蔣介石沒有理由反對，只好贊成。“會議紀要”上所發表的和平方針和若干民主協議，一方面是寫在紙上的，還不是現實的東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決定的。解放區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國際形勢，大勢所趨，使得國民黨不得不承認這些東西。

“針鋒相對”，要看形勢。有時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從前不去是對的，這次去也是對的，都是針鋒相對。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打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謊言。他們曾發三封電報邀請我們，我們去了，可是他們毫無準備，一切提案都要由我們提出。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成立了“雙十協定”以後，我們的任務就是堅持這個協定，要國民黨兌現，維護爭取和平。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事情就是這種，他來進攻，我們把他消滅了，他就舒服了。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中國的問題是複雜的，我們的腦子也要複雜一點。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為了爭取和平。不給敢于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會來的。

有些同志問，為什麼要讓出八個解放區⑤？讓出這八塊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讓出為好。為什麼可惜？因為這是人民用血汗創造出來的、艱苦地建設起來的解放區。所以在讓出的地方，必須和當地的人民解釋清楚，要作妥善的處置。為什麼要讓出呢？因為國民黨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區，在他的床旁邊，或者在他的過道上，我們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覺，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爭。在這一點上我們採取讓步，就有利於打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國內外廣大中國分子的同情。現在全國所有的宣傳机

美，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們都是謠言制造厂。这一次談判，它們造謠說：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我們的方針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損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則下，容許作一些讓步，用这些讓步去換得全國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們過去和蔣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并且比現在的还大。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實現全國抗战，我們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紅軍也改名为国民革命軍，还把沒收地主土地改为減租減息。这一次，我們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謠言完全破产。軍队的问题也是这样。国民党宣傳說，共产党就是爭槍桿子。我們說，准备讓步。我們先提出把我們的軍队由現在的数目縮編成四十八个師。国民党的軍队是二百六十三個師，我們占六分之一。后来我們又提出縮編到四十三個師，占七分之一。国民党說，他們的軍队要縮編到一百二十個師，我們說，照比例減下来，我們的軍队可以縮編到二十四個師，还可以少到二十個師，还是占七分之一。国民党軍队官多兵少，一个師不到六千人。照他們的編法，我們一百二十万人的軍队，就可以編二百個師。但是我們不这样做。这样一来，他們无話可說，一切謠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們的槍交給他們呢？那也不是。交給他們，他們豈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上面就是我向同志們講的时局問題。目前时局的发展，有許多矛盾現象。为什么国共談判中有些問題可以达成協議，有些問題又不能达成協議？为什么“会谈紀要”上說要和平團結，而实际上又在打仗？这种矛盾現象，有些同志想不开。我的講話就是答复这些問題。有的同志不能了解，蔣介石历来反共反人民，为什么我們又愿意同他談判呢？我党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只要国民党的政策有所轉变，我們就愿意同他們談判，这对不对呢？这是完全对的。中国的革命是長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中国的前途如何，靠我們大家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內，局势还会是动蕩不定的。我們要加倍地努力，爭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还講一点我們的工作。在座的有些同志要往前方去。許多同志滿腔熱忱，爭着出去工作，这种積極性和熱情，是很可貴的。但是也有个别的同志抱着錯誤的想法，不是想到那里有許多困难需要解

决，而是認為那里的一切都很順利，比延安舒服。有沒有人這樣想呢？我看是有的。我勸這些同志改正自己的想法。去，是為了工作的。什麼叫工作，工作就是鬥爭。那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着解決困難去工作、去鬥爭的。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志。那些地方的工作是很艱苦的。艱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擺在我們的面前，看我們敢不敢承擔。担子有輕有重。有的人拈輕怕重，把重担子推給人家，自己揀輕的挑。這就不是好的態度。有的同志不是這樣，享受讓給人家，担子揀重的挑，吃苦在別人前頭，享受在別人後頭。這樣的同志就是好同志。這種共產主義者的精神，我們都要學習。

有許多本地的幹部，現在要離鄉背井，到前方去。還有許多出生在南方的幹部，從前從南方到了延安，現在也要到前方去。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應當做好精神準備，準備到了那里，就要生根、開花、結果。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我們的同志不論到什麼地方，都要和羣眾的關係搞好，要關心羣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團結廣大人民，團結得越多越好。放手發動羣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這是黨的七次代表大會的方針^①，我們要為這個方針奮鬥。中國的事情，要靠共產黨辦，靠人民辦。我們有決心、有辦法實現和平，實現民主。只要我們同全體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了，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這是总的趨勢。倫敦五國外長會議失敗了^②，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呢？不會的。試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打完，怎麼就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呢？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許多國際事務上，還是妥協的，因為妥協有好处^③。反蘇反共的戰爭，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人民都堅決反對。在最近的三十年內，打過兩次世界大戰。在第一次大戰和第二次大戰之間，間隔了二十幾年。人類歷史五十萬年，只有在這三十年內才打過世界戰爭。第一次大戰以後，世界有很大進步。這一次大戰以後，世界一定會進步得更快。第一次大戰以後，產生了蘇聯，全世界產生了几十個共產黨，這是從前沒有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更強盛了，歐洲的面貌改變了，全

世界无产階級和人民的政治覺悟更提高了，全世界的進步力量更團結了。我們中國也处在急劇的變動中間。中國發展的總趨勢，也必定要變好，不能變壞。世界是在進步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歷史的總趨勢任何人也改變不了。我們應當把世界進步的情況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傳，使人民建立起勝利的信心。同時，我們還要告訴人民，告訴同志們，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有許多障礙物，還有許多困難。我們黨的七次代表大會設想過許多困難，我們寧肯把困難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願意多想困難。但是困難是事實，有多少就得承認多少，不能採取“不承認主義”。我們要承認困難，分析困難，向困難作鬥爭。世界上沒有直路，要準備走曲折的路，不要貪便宜。不能設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動派會統統自己跪在地下。總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面前困難還多，不可忽視。我們和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一定能夠排除萬難，達到勝利的目的。

注：

- ① 這里是指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的“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在這個紀要中，蔣介石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承認“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也不得不同意迅速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的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取消特務機關，“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釋放政治犯”，“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等。同時，蔣介石政府卻頑固地拒絕承認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民主政權的合法地位，並妄圖在“統一軍令”和“統一政令”的旗號下，根本取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以及無法就這個問題達成協議。

鲁迅雜感选集序言(节选)

瞿秋白

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論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他热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襲击着宗法社会的僵尸統治，要求个性的解放。可是，不久他就漸漸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級制度和中國社会里的层层压榨。一九二四年——二五年，他的《春末》閒談，《灯下漫笔》，《杂忆》（填），以及整部的《华盖集》，尤其是一九二六年的《华盖集續編》，都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統治的火焰。自然，这不是社会科学的論文，这只是直感的生活經驗。但是他的神圣的憎恶和諷刺的鋒芒，都集中在重閣官僚和他們的叭儿狗。

“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偉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經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別，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陣营，別方面是依附封建殘余的资产階級。这新的反动思想，已經披了欧化，或所謂五四化的新衣服。这个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方才完成，而在一九二五——二六的时候，却已經准备着，只要看当时段祺瑞章士釗的走狗“現代評論”派，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是怎样的得其所哉，就可以知道这中間的奧妙。而鲁迅当时的《語絲》革命的小资产階級的文藝思想和批評，正是針對着这些未来的“官場學者”的。現在的讀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續編里，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經不大知道“陳西滢”等类人物的履歷，所以不覺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陳西滢”，就是章士釗（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簡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們个人的履歷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們这种“媚态的貓”，“比他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預先哼哼地发一通議論的蚊子”，“噙着地鬧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蒼蠅”……到現在还活着，活着！揭露这些卑劣，懦弱，无耻，虛伪而又殘酷的劊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御綫。

的确，旧的衛道先生們漸漸的沒落了，于是需要在他們这些僵尸的血管里，注射一些“欧化”的西洋国故和牛津劍哥倫比亞的學

尸主义；再加上一些洋場流氓的把戏，然后僥倖可以暂时“复活”，或者多留恋几年“死尸的生命”。这些欧化紳士和洋場市儈，后来就和“革命軍人”結合了新的帮口，于是僵尸統治，变成了戏子統治。僵尸还要做戏，自然是再可怕也没有了。

“中国的原始極暴式的商业資本，在乡村之中和封建統治的地主有一种特別形式的結合。中国的軍閥和一切殘酷无情搶劫民众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特別形式的結合的上层建筑。帝国主义和他們所有的一切財政上軍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国維持并且推动这些封建殘余以及它們的全部軍閥官僚的上层建筑，使它們欧化，又使它們守旧。”（約瑟夫）这就是中国僵尸欧化的原因。袁世凱以来的北洋軍閥要想穩定这种新的統治，但是，他們只会运用一些“六君子”之类“开国元勳”；“后来的武人可更蠢了……除了殘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華蓋集續編》《一点比喻》）。問題是在于要統治奴隶就要有一定的奴隶規則（《墳》《灯下漫笔》），而新的奴隶規則，要新的“山羊”来帮忙才定得出來。这样的山羊，“頸子上还挂着一个鈴鐺，作为知識階級的徽章……能領了羣众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它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这是說：虽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華蓋集續編》：《一点比喻》）。段祺瑞章士釗时代——“五卅”时代的陳西滢們，都企图做成这样的“山羊”。虽然这企图延長了若干年，而他們現在是做“成功”了！新的朝代，有了新的“帮忙文人”，而且已經象生殖力最強的猪鬃和臭虫似的，出生了許許多多各种各式的徒弟徒孙。当时——一九二五，二六年——他們的努力，例如勒杀“學匪”，或者貴出西哲勒本殺尔來痛打女師大的“毛丫頭”之类，算不算枉費的。

魯迅当时反对这些欧化紳士們的战斗，虽然隱藏在个別的甚至私人的問題之下，然而这种战斗的原則上的意义，越到后来就越要明显了。統治者不能完全只靠大砲机关槍，一定要需某种“意識代表”。这些代表們的虛偽和戏法是无窮的。暴露这些“假戏的虛无主义者”（《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也就必須有持久的牺牲的斗争。

他們在“五卅”的时候，說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分裂与陷

忌的現象”(徐志摩)，說中國人的“打，打，宣戰，宣戰，”是“這樣的中國人，呸！”——這意思是中國人該被打而不做聲(陳西滢)。他們在二一八之後立刻就說“執政府前原是‘死地’，……羣衆領袖應該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墨寫的謊說”難道掩得住“血寫的事實嗎”？！然而魯迅在這次做了一個“錯誤”：“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坏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这地步！”（《華蓋集續編》；紀念《劉和珍君》）他在當時已經說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然而他更不料一兩年後的黑暗會超越“三一八”屠殺的几百千倍。魯迅如果有“錯誤”，那末，我們不能夠不同意他自己的批評：“我還欠刻毒！”地主官僚和資產階級社會的醜惡，實在遠超出于文學家最深刻的“描陷別人的罪狀”！而文飾這種醜惡的，正是那些山羊式的文人。

所以當五卅時期，一般人，甚至革命者的思想，都在“一致對外”的口號之下，多多少少忽略了國內階級戰爭的同時開展；這又是新的階段的更加嚴重的問題。而魯迅就提出這樣的質問：“然而中國有第幾階級的哀悼平民，却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十一》）回答這個問題的，是“五卅”之後的鉅大的羣衆革命浪潮。革命是在進到新的階段，“死者遺給後來的功勳，是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華蓋集續編》；《空談》）這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就必須打倒這些陰毒“東西”——動物！就不再是請願，不只是“和平宣傳”，不是合法主義，而是……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蔷薇之二》）

此後的“血債”是越拖越多了。

泪干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而已集》《題辭》）

僵尸的統治轉變為戲子的統治，這個轉變完成之後不啻于假戲的僵尸雖然退了位，而會變戲法的僵尸就更猖獗起來。活人和死人的鬥爭，死亡路上的階級的掙扎和新兴階級領導的羣眾的反抗，經過一番暴風雨劇變而進到了新的階段。魯迅說，“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心目眩暈，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胆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就是以後的《三閒集》（一九二八——二九），《二心集》（一九三〇——三一），又何嘗不是哭笑不得的“而已”！可是，正是這期間魯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壓迫被侮辱被欺騙的人們的彷徨和憤懣，他才從進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級鬥爭，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如果在以前，魯迅早就感覺到中國社會里的科舉式的貴族階級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農奴階級之間的對抗，那麼，現在他就更清楚的見到那種封建式的階級對抗之外，正在發展着資本和勞動的對抗。他“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然而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他的“思路因此蕩毀”（《三閒集》《序言》）。是的，以前（《父與子》）的黨分鬥爭只是前一階段的階級鬥爭的外套現在——封建宗法殘余的統治摻雜了一些流氓資本的魔咒，——不但更明顯的露出勞動和資本的階級戰鬥，而且反封建殘余的鬥爭也不再是純粹的（《父與子》）鬥爭的形式。同時，新兴階級的領導展開了真正推翻帝國主義和僵尸，推翻流氓資本和地主官僚的新結合的遠景。貧民小資產階級和革命的知識階層，終於發見了他們反對剝削制度的朦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會主義的先進階級前進，才能夠實現，才能夠在偉大的鬥爭的集體之中達到真正的“個性解放”。

這樣，當時革命“過程”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五四式的知識階層的最終分化：一些所謂歐化的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喪家的”或者“不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替新的反動去裝點一下摩登化的東洋國故和西洋國故。而另外一些革命的知識青年却更確定更明顯地走到勞動民眾方面來，圍繞着革命的營壘。最優秀的最真誠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始終是要堅決的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

最早期的真正的革命文学运动——五四式的新文学分化之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不能不首先反对摩登化的道老道少，反对重新摆上的“诱人‘的’筵宴”，以及这种筵宴旁边的鼓乐队。蹂躏革命“战士的精神和血肉……尝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这些流氓式的戏子，扶着几乎断送“死尸生命”的匪徒，“稳定了”他们的新的统治。于是乎他们的鼓乐队里，就搀和了些“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国的霍普德曼，（冤枉！），西班牙的伐木纳兹，中国的吴××”等等，而偏偏还要说这是革命文学！——其实是“在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们的敌手的”低能儿（《而已集》：《革命文学》），这其实是段政府之下的陈西滢们的佳子佳孙。据说是段祺瑞等投降了“革命”，陈西滢们“转变了”方向；然而就社会的意义上来说，究竟是誰投降了誰，誰转变了方向，是大成問題的。这时候的新戏法，只在于：“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許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而已集》：《扣絲杂感》）

“独木小桥”始終只是独木小桥。那些“扑通，扑通”掉下去的却学会了游水。真正的革命文艺思想正在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的发展。在这新阶段上，革命文艺思想经过内部的斗争而逐渐地形成新的阵营。这种不可避免的斗争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父与子的問題，也不仅是暴露指挥刀后的屠伯們的問題。这是关于革命队伍的戰略的爭論。

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与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集中新的队伍，克服过去的“因袭的重担”，同时，扩大同盟人的阵线。这不但在日本，美国，德国，甚至于在苏联，也经过波格唐諾夫式的幼稚病。关于这种幼稚病，德国的皮哈曾經说过：一些小集团居然自以为独得了“工人阶级的文化代表的委任状”——包办代表事务。这大概是“历史的误会”。創造社的转变，太陽社的出現，只在这方面看来，是有客观上的革命意义的。

然而革命車进行的时候，“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感到，后来的这队伍也就成为純粹，精銳的队伍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者》），无产阶级和周圍的各种小资产阶级之間本來就沒有——一座万里

長城隔开着。何況小資產階級又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階層和集團呢。

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階層之中，有些是和中國的農村，中國的受盡了欺騙壓榨束縛盤弄的農民羣眾聯繫着。這些農民從幾千百年的痛苦經驗之中學會了痛恨老鄉和地主，但是沒有學會，也不能夠學會怎樣去回答這些問題，怎樣去解除這種痛苦。“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却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三間集》：《現今的新文學的概況》）然而，寬泛些說，這種文藝當然也是革命的文學，因為它至少還能夠反映社會真相的一方面，暗示改革所應當注意的方向。而同時，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過程，時常不是立刻就能夠脫離個性主義——懷疑羣眾的傾向的；他們看得見羣眾——農民小私有者的羣眾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於馴服的奴隸性，可是，往往看不見這種羣眾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見他們的笨拙的守舊的口號背後蘊藏着革命的價值。魯迅的一些雜感裏面，往往有這一類的缺點，引起他對於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

另一方面，“五四”到“五卅”之間中國城市里迅速的積聚着各種“薄海民”（Dohemian——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的知識青年。這種知識階層和早期的士大夫階級的“道子武臣”，同樣是中國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結果，同樣是帝國主義以及軍閥官僚的犧牲品，同樣是被中國畸形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過程所“擠出軌道”的孤兒。但是，他們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們和農村的聯繫更稀薄了，他們沒有前一代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現實主義——也可以說是老實的農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反而傳染了歐洲的世紀末的氣質。這種新起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的“嬌度”關係，往往首先捲進革命的怒潮，但是，也會首先“落荒”或者“頹廢”，甚至“叛變”，——如果不堅決的克服自己的浪漫諦克主義。“這種典型最會輕蔑地點着鼻子說：‘我不是那種唱些有機的工作，實際主義和新進主義的贊美歌的人。’這種典型的社会根源是小資產者，他受着戰爭的恐怖，突然的破產，空前的飢荒和破壞的打擊而發瘋了，他歌斯替利地亂

提，寻找着出路和挽救，一方面信仰无产阶级而赞助它，别方面又绝望地在跳，在这两方面之间动摇着。”（烏良諾夫）这种人在文艺上自然是“才子”，自然不肯做“培养天才的泥土”，而很早“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坟》：《未有天才之前》）革命的怒潮到了，他們一定是革命的；革命的暂时失败了，他們之中也一定有些消極，有些叛變，有些在跳，而表示一些“令人‘知重革命的厉害’，只因自己說得暢快的度态，也还是中了才子十流氓的毒。”（《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于是“包办”工人阶级文艺代表的“事务”。

《三閑集》以及其他杂感集之中所保留着的鲁迅批評創造社的文章，反映着二七年以后中国文艺界之中这两种态度，两种傾向的爭論。自然，鲁迅杂感的特点，在那时特別显露那种经过私人問題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現象的笔調。然而創造社等类的文学家，單說真有革命志願的（像叶灵鳳之流的投机分子，我們不屑去說到了）也大半扭扭着私人的态度，年紀，气量以至酒量的問題。至少，这里都表現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

这时期的爭論和糾葛轉变到原則和理論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學說的介紹，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而还有人說：那是鲁迅“投降”了。現在看来，这种小市民的虛榮心，这种“剝削别人自尊心”的态度，实在天真得可笑。

这是已經过去的問題了，也应当是过去的了。

鲁迅現在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們說了一大堆还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論的偏頗。”（《三閑集》：《序言》）“我时时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还是丰产内战意介派分子的不脾气。”（《二心集》：《序言》）

鲁迅从进化論进到阶级論，从紳士阶级的逆子貳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战斗，从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观察之

中，帶着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他終于宣言：“原先是憎惡這幫亂的本階級，在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二心集》：《序言》）關於最近期間，“九一八”以後的察感，我們不用多說，他是站在戰鬥的前線，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在以前，就痛切的指出來：“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最妄的歡呼，將慘慘的弱者的呼聲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貪食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墳》：《地下漫筆》）而現在，這句話里的“青年”兩個字上面已經加上了新的形容詞，甚至于完全換了幾個字，——他在日本帝國主義劫手瓜分，英、美國聯進行着共管，而中國的神前統治階級要着各種各樣的戲法，準備發賣中國的時候，——忍不住寫着那些“民族主義文學者說：‘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务，永含着悲主的哀歌，直到……階級革命的風雲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異方和腐爛的運命。’”（《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务和運命》）。

然而魯迅筆下的價值決不止此，他自己說：“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討，易制強敵的死命。”（《墳》：《寫在‘墳’後面》）從滿清末期的士大夫，老新黨，陳西滢們……一直到最近期的洋場無賴式的文學青年，都是他所亲身跟教過的。創子手主義和僵尸主義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氓顧皮的冒險家主義，无耻，卑劣，虛偽的才子們的把戲，不能夠逃過他的銳利的眼光。歷年的戰鬥和劇烈的轉折給他許多經驗和教訓，經這清洗和融化之後，流露在他的筆端，這些革命傳統（revolutionary tradition）對於我們是非常之寶貴的，尤其是在集體主義的照耀之下：

一，是最清苦的現實主義。“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騙和騙，因此也生出滿和滿的文艺來，由這文艺，更令中國人更深地落入黑暗和痛苦的大澤中，甚而至于已經自己不見得。”（《墳》：《論了眼看》）這種思想其實反映着中國的最黑暗的壓迫和剝削制度，反映着當時的經濟政治關係。科舉式的封建等級制度，給每